

 高级中学 拓展型课程

高中历史

高中三年级 教学参考资料（试验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雯

经上海市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
准予试验用 准用号 II-GJ-2019005

高级中学 拓展型课程
高中历史
高中三年级 教学参考资料(试验本)
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课程改革委员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当纳利(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90×1240 16 开 印张 15.75 字数 458 千字
2010 年 7 月第一版 2019 年 8 月第九次印刷
ISBN 978-7-5617-7856-2/G·4578

定价：27.40 元

此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径向本社调换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电话：021-60821711



绿色印刷产品



高级中学 拓展型课程

高中历史

高中三年级

教学参考资料（试验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中历史高中三年级教学参考资料:试验本/余伟民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6

上海二期课改教材

ISBN 978-7-5617-7856-2

I. ①高… II. ①余… III. ①历史课—高中—教学参考资料 IV. ①G634.5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8437 号

目录

第一单元 儒家文化与古代中国

第一单元概述/1

第1课 先秦儒家与两汉经学/2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2
- 二、教学设计建议/2
- 三、习题分析/4
- 四、课文注释/5
- 五、参考书目/9

第2课 宋明理学/10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10
- 二、教学设计建议/10
- 三、习题分析/12
- 四、课文注释/13
- 五、参考书目/17

第3课 家族制度与君主政治/18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18
- 二、教学设计建议/18
- 三、习题分析/20
- 四、课文注释/20
- 五、参考书目/24

第4课 礼制规范/25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25
- 二、教学设计建议/25
- 三、习题分析/27
- 四、课文注释/27

五、参考书目/31

第5课 儒家文化的传播/32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32
- 二、教学设计建议/32
- 三、习题分析/34
- 四、课文注释/35
- 五、参考书目/39

第二单元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

第二单元概述/40

第6课 思想潮流的演进/41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41
- 二、教学设计建议/41
- 三、习题分析/44
- 四、课文注释/45
- 五、参考书目/49

第7课 新文化运动的勃兴/50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50
- 二、教学设计建议/50
- 三、习题分析/53
- 四、课文注释/53
- 五、参考书目/57

第8课 新式教育的发端/58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58
- 二、教学设计建议/58

- 三、习题分析/61
- 四、课文注释/62
- 五、参考书目/66

第9课 科技与文化的发展/67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67
- 二、教学设计建议/67
- 三、习题分析/70
- 四、课文注释/70
- 五、参考书目/74

第10课 社会生活的变迁/75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75
- 二、教学设计建议/75
- 三、习题分析/78
- 四、课文注释/78
- 五、参考书目/83

第三单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 现代中国

第三单元概述/84

第11课 毛泽东思想/86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86
- 二、教学设计建议/86
- 三、习题分析/89
- 四、课文注释/89
- 五、参考书目/92

第12课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93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93
- 二、教学设计建议/93
- 三、习题分析/95
- 四、课文注释/97
- 五、参考书目/103

第13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04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104
- 二、教学设计建议/104
- 三、习题分析/107
- 四、课文注释/108

- 五、参考书目/114

第四单元 中国史学的发展

第四单元概述/115

第14课 古代的史家与史籍/116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116
- 二、教学设计建议/116
- 三、习题分析/118
- 四、课文注释/119
- 五、参考书目/122

第15课 史学的转型/123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123
- 二、教学设计建议/123
- 三、习题分析/125
- 四、课文注释/126
- 五、参考书目/130

第16课 现代史学名家/131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131
- 二、教学设计建议/131
- 三、习题分析/133
- 四、课文注释/134
- 五、参考书目/138

第五单元 上海历史的变迁

第五单元概述/139

第17课 开埠之前的上海/141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141
- 二、教学设计建议/141
- 三、习题分析/143
- 四、课文注释/144
- 五、参考书目/146

第18课 近代上海市政的变迁/147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147
- 二、教学设计建议/147
- 三、习题分析/149
- 四、课文注释/150
- 五、参考书目/153

第19课 近代上海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 /154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 /154
- 二、教学设计建议 /154
- 三、习题分析 /157
- 四、课文注释 /157
- 五、参考书目 /162

第20课 近代上海文化的发展 /163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 /163
- 二、教学设计建议 /163
- 三、习题分析 /165
- 四、课文注释 /166
- 五、参考书目 /169

第21课 发展中的新上海 /170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 /170
- 二、教学设计建议 /170
- 三、习题分析 /172
- 四、课文注释 /173
- 五、参考书目 /175

第六单元 古代世界的帝国

第六单元概述 /176

第22课 波斯帝国与亚历山大帝国 /177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 /177
- 二、教学设计建议 /177
- 三、习题分析 /179
- 四、课文注释 /180
- 五、参考书目 /189

第23课 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 /190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 /190
- 二、教学设计建议 /190
- 三、习题分析 /192
- 四、课文注释 /193

五、参考书目 /195

第24课 阿拉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 /196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 /196
- 二、教学设计建议 /196
- 三、习题分析 /198
- 四、课文注释 /199
- 五、参考书目 /200

第七单元 17—18 世纪的启蒙思想

第七单元概述 /201

第25课 17世纪英国的启蒙思想 /202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 /202
- 二、教学设计建议 /202
- 三、习题分析 /204
- 四、课文注释 /204
- 五、参考书目 /208

第26课 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 /209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 /209
- 二、教学设计建议 /209
- 三、习题分析 /211
- 四、课文注释 /212
- 五、参考书目 /214

第27课 启蒙思想的传播 /215

-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 /215
- 二、教学设计建议 /215
- 三、习题分析 /217
- 四、课文注释 /217
- 五、参考书目 /223

练习部分参考答案 /224

第一单元 儒家文化与古代中国

第一单元概述

本单元的内容主要涉及三个要点：其一，儒家学说的核心理论，以及儒学的理论形态在先秦、两汉、宋明三个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其二，儒家文化对古代中国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其三，儒家文化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讲授中应着重把握以下线索：

一、孔子创立的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一套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伦理、政治学说。他以血缘亲情为基点，希望恢复宗法制度下的身份等级秩序。孟子和荀子分别从两个侧面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孟子主张凭借内心的“善”来推行仁政，使国家长治久安；荀子强调以外在的规范来制约内心的“恶”，使国家秩序井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糅合阴阳五行学说对儒学加以改造，在“天人感应”之说的基础上重申了儒家的伦理纲常，使儒学成为具有独尊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宋明理学家则将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升至新的高度，使之更为精致而周密。其间，虽出现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对抗，但两者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都力图在高度的理性认识和道德意识的基础上，使儒家的伦理规范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

二、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核心是家族制度，传统的社会伦理、国家伦理皆可从家族伦理推衍出来。中国古代君主政治的主要特征是封建君主专制，其形成和发展与家族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儒学是与家族制度密切联系的理论体系，因此，在家族制度和封建君主专制长期延续的过程中，儒家文化在社会观念、行为规范、政治思想、法律制度等方面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儒家文化很早就传入东亚、东南亚地区，并在越南、朝鲜、日本等国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近代西方势力进入之前，东亚大陆曾长期存在一个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儒家文化圈”。时至今日，越南、朝鲜、日本等国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习俗仍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儒家文化的元素。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早期多局限在物质文化层面。约在 16 世纪，儒家典籍开始被翻译、介绍到欧洲，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对儒学的西传做出了很大贡献。至 18 世纪，已有大量儒学著作传到欧洲，并在当地激起很大反响，一度成为启蒙思想家对抗教会的思想武器。

第1课 先秦儒家与两汉经学

儒家是在乱世求治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学术思想流派。汉武帝继位后,儒学在各家学说中获得“独尊”地位,被统治者极力推崇,成为历朝历代的统治思想和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广泛而深远。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

(一) 教学目标

1. 知识与技能

知道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主要观点是“仁”“义”;知道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是孟子、荀子;知道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提出“大一统”“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知道汉代“经学”兴起;知道汉以来,儒学逐渐成为历朝历代的统治思想和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2. 过程与方法

学习儒家文化与大一统统治的内容,基本了解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初步掌握运用哲学方法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通过学习,基本了解从历史文献中获取历史信息的方法。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学习“孔孟之道”,懂得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基本内涵,初步理解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形成文化认同与增强民族凝聚力。

通过学习“儒学的经学化”,懂得儒家传统道德思想,懂得“仁”“义”“礼”“智”“信”等中国传统道德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与普世意义,从而学会正确地认识传统文化。

(二) 教学重点

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儒家学说发展变化的过程。

二、教学设计建议

(一) 教学过程建议

本单元的主题是“儒家文化与古代中国”。儒家文化属于思想史范畴,理解难度较大。建议在教学前引导学生回顾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致进程,指出儒家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内涵,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引起儒家文化内部冲突,推动儒家文化内涵不断变化的原因。帮助学生理解儒家文化对古代中国、儒家文化圈国家以及西方一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生活等方面带来的影响。

● 孔孟之道

1. 回顾第二分册第4课《封邦建国与礼乐文化》中关于周公“制礼作乐”的相关内容,由此导入教学。再回顾第二分册第5课《社会变革与百家争鸣》的相关内容,提问:“百家争鸣”时期有哪些主要学

派? 学生回答后, 出示下表, 并以问答方式加以解释。

| 时期 | 代表人物 | 主要思想观点 |
|----|------|--|
| 春秋 | 孔子 | 礼: 重建周礼, 遵循宗法制度的原则, 以“礼”的规范约束人们的一切言行, 使社会成员恪守传统的等级秩序, 才能重建社会秩序 仁: “复礼”的关键在于“为仁”,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以“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 义: “义”为判断所有事物的价值标准, 人们的言行举止符合“礼”的规范和“仁”的精神, 就是“义”; 正人君子应重义轻利 |
| 战国 | 孟子 | 认为人性本善, 而人性本善是仁、义、礼、智的道德标准基础与开端;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仁政 |
| | 荀子 | “性恶论”; 注重外在的社会规范和刑罚制度对人的制约作用; 政治上主张礼法兼治, 王霸并用 |

2. 在解读孔子、孟子、荀子思想观点的基础上, 可进一步分析孔孟之道内在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如:

孔孟之道: 由孔子创立, 孟子继承、发展的儒家学说, 后人习称“孔孟之道”。

礼源于原始先民的习俗仪式。礼制则起源于西周周公“制礼作乐”, 周公把尊礼视为德治的重要内容, 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 对后世儒家学说和我国古代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的儒家学派继承了西周社会的“礼乐”文化,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仁”与“义”的主张。孟子和荀子则从人性的本原视角思考问题, 以此来论证其观点的合理性。孟子思想的基础是人性本善, 因为人性本善, 故有仁、义、礼、智, 故有民本, 故有仁政。荀子认为人性本恶, 因而需要通过教育、制度、刑罚来教化人, 以达到社会的有序。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 儒家学说在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丰富起来, 这一过程, 也是儒家学者对人性、社会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 儒学的经学化

1. 回顾第二分册第 8 课《大一统帝国的重建》与第 9 课《汉武帝时代》的相关内容, 指出: 在西汉武帝时期, 王权与相权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中原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此时, 自身不断完善, 内涵不断丰富儒家学说为汉武帝解决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董仲舒的理论较难理解, 因此需要解读其学术思想。出示下表:

| 董仲舒的主要理论观点 | | |
|------------|---|--|
| 天人感应 | 政治上 | 倡导“君权神授”, 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 天子受命于天, 秉承天意治理人世, 所以臣民必须服从天子; 同时, 天又对天子进行监督考察, 通过祥瑞和灾异予以褒奖或谴责 |
| | 伦理上 | 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认为君臣、父子、夫妻的等级差别出于天的安排; 并将仁、义、礼、智、信视作为人处世永恒的道德准则, 后人习称“三纲五常” |
| 大一统 | 提出“大一统”的主张, 建议“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以思想上的一统维护政治上的统一 | |

2. 在解读董仲舒思想观点的基础上, 可进一步分析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大一统理论之间的关系。

关于天人感应: 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天命论”思想, 并用阴阳五行说加以解释。董仲舒用“天”来表示人世、自然间一切秩序的本原, 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 天子受命于天, 秉承天意治理人世, 这样, 就将天子置于最高地位, 倡导“君权神授”, 所以臣民必须服从天子。同时, 天又对天子进行监督考察, 通过祥瑞和灾异予以褒奖或谴责。

关于三纲五常: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提出三纲五常的观点。“三纲”是指“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 要求为臣、为子、为妻必须服从君、父、夫, 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做出表率。“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三纲五常”体现了天道秩序, 应视作为人处世永恒的道德准则。

关于大一统: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大一统”,就是维护当时已经形成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他认为诸侯必须服从“天子”的统治,这种大一统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也是古今通行的。

3. 有关儒学经学化的过程,可结合教材的“知识链接”,提问:儒学是怎样经学化的? 学生回答后指出:儒学从“经学”成为“经典”之学,经历了一个经学化过程。西汉武帝以后,儒学“独尊”,地位在其他诸子百家之上,儒家典籍被称为“经”,解释和阐发儒家经典成为专门的学问,称为“经学”。“经”自此成为儒家典籍的特称。武帝规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设立五经博士,专事儒经的研究与传授。后又在长安兴办太学,教授五经,入学者完成学业经考试合格,即可担任官职。郡县也建立地方学校,配有经师授学,以培养官吏的后备人选。由于经学的研习、传授为学者的人仕开辟了通途,通经致用成为文人学士的普遍追求。汉代以来,儒学逐渐成为历朝历代的统治思想和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广泛而深远。

4. 基础较好的学校,可进一步探讨董仲舒理论的渊源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

董仲舒曾专治《公羊传》,其“大一统”思想即来源于此。董仲舒也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天命论”思想。汉初盛行讖纬之学,董仲舒又受其影响,使其理论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董仲舒的理论学说可视为人类对于天道,即达于至善路径上的某种求索。故而,董仲舒思想是春秋战国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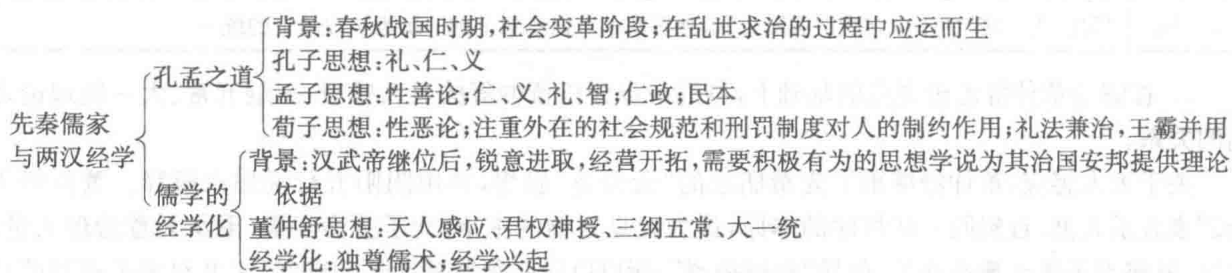
告诉学生:秦代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秦的统一措施有利于国家的大一统统治,但事实上,文化思想领域的真正统一在汉代。汉初,思想界盛行黄老之学。至汉武帝时,面对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统治者急欲借助封建神学中天神的权威来弥补自己强力统治的不足。汉武帝为了加强王权,削弱相权,加强中央实力,削弱地方势力,巩固大一统集权统治,迫切要求建立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然而,各种学派林立,人们各持己见,莫衷一是,使得汉武帝无法坚持一统;加上法制屡变,臣下也无所适从。怎样办? 在他看来,要保证政治和法纪的统一,首先必须达成思想上的统一。为此,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总结:在完成学习后,可引导学生分析、归纳:儒家学说从初创到取得独尊地位,其主要思想内容有何发展变化? 如:春秋时期,孔子提出“礼”“仁”“义”的思想观点;战国时期,孟子从人“性本善”出发,提出“仁”“义”“礼”“智”,以及“仁政”的学说;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提出“礼法兼治”“王霸并用”;汉朝,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之说,政治上倡导“君权神授”,伦理上强调“三纲五常”;董仲舒之后,儒学经学化,并逐渐成为历朝历代的统治思想和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基础较好的学校还可以进一步探究引起这种思想变化的社会因素有哪些。

(二) 知识结构图示



三、习题分析

1. 练习与思考 1

本题内容涉及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判定问题。题目给出三种不同的观点。答案是多元的,只要学

生能提出观点,自圆其说即可。而且,问题考察的是学生论证历史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引导学生探讨该问题时,可以进一步引出:孔子讲义,是否绝对否定利?是否将义与利决然对立?韩非子讲利,是否绝对否定义?

其实,不管是孔子还是韩非子,在义利之辨中,都没有将利与义绝对对立起来,只是侧重点不同。如:孔子也讲“庶之,富之,教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不过是孔子更讲仁、礼;韩非子则更注重利的功用。究其原因,实是两者的立场观点不同、思想方法不同所致。孔子提出礼、义、仁,故更重义,韩非子出于战国时期社会现实需要,主张法治、刑赏,故而更重利。

义利之辨发展至宋明时期,成了一大命题,即“义利之辨乃人禽之别”,君子与小人便成了绝对对立的道德观念,这是基于宋明理学思想观念之上的。后世学者如清代颜元主张义利统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就现实社会现状的思考而得出的结论。

2. 练习与思考 2

孔子强调“仁”,是从最亲近的血缘关系入手,推而广之,以此实现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礼,恢复礼制,实现社会秩序的安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则通过“天人感应”将儒家的伦理学说神圣化、绝对化,强调“天意安排”。孔子的学说从启发人的内在道德意识和自觉要求入手,董仲舒则强调“天意安排”,这是他们学说最大的不同。

四、课文注释

1. 儒家关于“礼”“仁”“义”的学说

儒家学说中的“礼”,是指一种特定的行为规范。孔子非常推崇西周的典章制度,认为因革于夏礼和殷礼的周礼最为完善,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所以他说的“礼”往往专指周礼。儒家认为,春秋时期的社会动乱,根本原因就在于名分紊乱。要纠正时弊,最可靠的手段就是重建周礼的权威。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就是要求以周礼来约束人们的一切言行。而维护周礼,必须从“正名”入手,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正名”就是要辨正礼制等级的名称和名分,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使人人都明白自己在社会中的特定位置,控制自己的“欲”,不超出“名分”所规定的范围,从而消除争乱。

按照儒家的阐释,“礼”的内涵极为丰富。举凡社交礼仪、生活标准、政治秩序、风俗习惯,无不囊括在内。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礼”从各个侧面、各个层次、各个角度,细致入微地规定了每个社会成员的地位、责任、义务。“礼”承认每一社会个体的基本生存权利,认为每一个个体在获得一份生活资料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从而为整个社会的和谐,确立了一个个安分的“细胞”。但是,“礼”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的主观能动精神和创造欲望,在严格的社会名分的重压之下,忽视了人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上述双重性,对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塑成崇奉公德、压抑私欲、强调义务、蔑视权利,以及安贫乐道、因循保守等社会文化心理特征,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在儒家学说中,“仁”为其思想核心。孔子即声称:“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仁”的概念,古已有之,最初的含意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善关系。如《尚书·金縢》中有“予仁若考能”之句,《诗经·郑风·叔于田》中有“不如叔也,洵美且仁”之句。至春秋时期,“仁”一词的使用已十分广泛,其涵义也更加丰富,涉及政治、道德、事功等多个层面。孔子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仁学”体系,以此作为儒学的思想核心。

《论语》中,“仁”出现的频率很高,达百次之多。据孔子自己解释,“仁”就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也解释:“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可见,儒家所说的“仁”,最基本的含义是指血缘纽带下的人与人的“相亲相爱”。儒家认为,仁是人的本性的最高表现,是人的美德的最高概括,所以,“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

公》)。如果说“礼”是行为的尺度,是人生的手段,那么“仁”就是行为的本身,就是人生的目的,因此“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孔子的政治思想倾向于保守,他极力维护的是日益瓦解的宗法制度。不过,孔子学说的最精妙之处在于以“仁”释“礼”,其基本方法是将外在的社会规范,转化为个体内在的自觉要求,从整顿人的社会性中最基本、最一般、最亲爱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以家国同构的精神推而广之,以求达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理想状况。这种由血统至政统再至道统的思想途径,深刻启发了后世儒者,从而形成一整套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先由社会政治收缩为家庭人伦,再由家庭人伦推广到社会政治,完成这样一次往返之后,“仁学”便因其植根于人们内心深处最贴近、最亲密的血亲观念之上,从而获得较其他学派更为可靠而巩固的地位。

儒家还提出“义”的概念,作为价值判断的准绳。凡是符合“礼”的规范和“仁”的精神的行为,就是“义”,否则,就是“不义”。孔子以义为立身之本,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孟子也说:“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

“行其义”就必须使一切言行举止与“礼”所规定的社会等级名分,以及成文、不成文的传统观念相符合,唯有如此,才能达到价值判断意义上“善”的要求,否则,“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义”与“善”近乎同义,“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因此,孔子一生不问有利无利,只问合义不合义。合于义,即为真、善、美;不合于义,即为伪、恶、丑。孟子做了进一步的阐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并以“君子犯义”与“小人犯刑”相提并论。在孟子的主张中,“义”已被推向极端,所以“舍生取义”是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

2. 历史上的“义利之辨”

义,指道义;利,指利益、功利。关于两者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各思想学派曾持有不同的观点,进行过长期的争辩,思想史上称之为“义利之辨”。

原本在孔子的思想中,义作为价值判断的准绳,并不是与利益、功利绝对对立的東西,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二律背反的关系。但经过孟子,尤其是西汉董仲舒的推衍,义与利便成为水火不容的对立面。如孟子曾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也明确指出:“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的话称:“夫仁人者,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自此,义利之辨成为有关人生价值观的争论焦点。

先秦诸子中,墨子重利,但也“贵义”,《墨经》说:“义,利也。”墨子三表中,最重要的第三表是“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法家韩非也注重功利,称:“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所以“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韩非子·奸劫弑臣》)。儒家学者,尤其是孟子、董仲舒等,则主张义利对立,重义轻利,尚义排利。汉代盐铁之议,以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万生等60余人为一方,以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公卿为另一方,曾在义利问题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前者主张“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务本抑末,毋与天下争利”;后者“以为此乃所以安边境、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后来桓宽著《盐铁论》,以为二者“或上仁义,或务权利”,是一次关于义利问题的大辩论。宋代理学家对义利之辨,极为关注。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二程遗书·师训》)朱熹也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子全书·学四》)可见,程、朱基本上承袭了董仲舒的观点。不过,儒家学者还有其他的观点。一是荀子、张载、程颐等人,他们都以义为重,但不绝对排斥利,主张先义而后利。一是李觏、陈亮、叶适等人,他们认为若无功利,道义便是无用之虚语。清初的颜元则明确提出义利统一的观点,他说:“正论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所以要“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

3. 孟子的“性善论”与“仁政”学说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为战国时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继

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被尊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孟子将道德规范概括为仁、义、礼、智四项，又将人伦关系概括为五项，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他认为仁、义、礼、智四项中，仁、义尤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亲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若人人皆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就能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为说明上述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人性本善的思想，认为人人都有“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为“四端”。为此，孟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的自觉性，认为“士”应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若遇到严峻考验，则应“舍生而取义”，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放弃道德原则。孟子还将伦理与政治紧密结合，强调道德修养是实行善政的根本。他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中提出的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程序，就是据孟子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在政治思想上，孟子继承孔子“仁”的观念和德治思想，并进一步发展为“仁政”学说。他将“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力图在统治与服从的政治关系上，蒙上一层血缘亲情的外衣，以缓和社会矛盾。他既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并对尊卑加以严格区分；又将上下尊卑的关系比作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像父母一样关心民众疾苦，民众应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从统治者。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状况，若统治者实行仁政，便可获得民众的衷心拥护；若不顾民众死活，推行虐政，必将失去民心而成为独夫民贼，被民众推翻。

“仁政”的具体内容非常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的是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一思想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情况，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经验，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并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民心向背是关乎天下得失的关键问题。他有关仁政的具体措施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轻刑薄赋，制民以产。孟子认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即实行井田制，给农户一定的田产，使其自给自足。“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若使民众“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自然不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君主的统治就可平安无事。

其二，听政于国民。孟子认为，君主应注意倾听民众的意见，用人得当，刑赏有度，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他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其三，与民同乐。孟子建议君主“与百姓同乐”；“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使百姓“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使百姓“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如此，“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当然不是让君主的生活下降至百姓的水平，只是提醒君主主要顾及百姓的生活需要，以此争取民心，进而稳固统治。

孟子的仁政学说达到了先秦民本思想的顶峰。对照商代末年一切以君为本的暴虐统治，显然是极大的历史进步。然而，所谓“民本”，其含义仍是，民为政治之本，民为统治之本，说到底，只是有识之士提出的一种比较明智的建议，其根本的出发点仍是维护统治者的长治久安。因此，与近代西方倡导的“民主”不可同日而语。

4. 荀子的“性恶论”与“礼治”思想

荀子（约前 313—前 238），名况，赵国（今山西省南部）人，为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之一。《韩非子·显学》提出，孔子去世后，儒分八家，即所谓“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其中“孟氏之儒”为孟子，而“孙氏之儒”，有

学者认为就是荀子。当代学者指出,孔门后学其实可分为主内、务外两大派。曾参、子思、孟子这一线属主内派,进一步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荀子则属务外派,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礼”的学说。

荀子与孟子不同,他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提出了以“性恶论”为基础,以“礼治”为核心的伦理、政治学说。他声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认为人性是先天而生,不学而能的,人的本性就是恶,就是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就是好利、嫉妒、喜欢声色的,顺着人性发展,就会出现暴乱。而人类为了生存,为了战胜自然,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组织——群,维持一定的等级秩序——分。这就要求有礼,礼可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所以,他特别强调“分”“辨”“别”,主张“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基于这一点,他强化了孔子的“礼治”观念,并融入法家思想,特别注重人们的等级差别以及外在的刑罚制度和社会规范对“人欲”的抑制作用。

荀子属儒家学派的传人,所以在论及君主与民众的关系时,并未背离儒家的立场,其名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在历史上影响深远。但由于他特别强调外在规范对人的制约作用,所以也受到法家的影响,其政治思想突出的一点就是主张礼法兼治、王霸并用。“礼义者,治之始也”(《荀子·王制》)、“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强国》)。荀子本人虽仅折中儒、法,未侧重任何一家,但究其基本立场,确实更接近“尊君”而非“贵民”,故与孟子迥异。荀子的学生韩非、李斯等,后来皆成为法家的代表,也说明荀子的学说中确实杂有法家的思想。

5. 今文经学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典籍被奉为“经”,研究儒家典籍的学问被称为“经学”。汉代流传的儒家经典有两种不同的书写文字。以汉代以前的古文字书写的,称为“古文经”;以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称为“今文经”,而训释、研究今文经的学问便称为“今文经学”。

儒家经典由孔子的弟子传授。“六经”中,《诗》《书》《礼》《春秋》,由卜商(子夏)传授,《易》由商瞿(子木)传授,上述经典在战国时期流传不绝;而《乐》早亡,后世失传。秦始皇焚书,因《易》为卜筮之书而不焚,《诗》形于歌咏,虽焚而不绝。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汉成帝求遗书于天下。传习的经书后经刘向等学者典校群书,写成提要,数量逐渐增多,于是按学术分类整理出一个端绪。

当时,《易》《诗》《书》《礼》《春秋》五部儒家经典称为五经。汉武帝立太学,置五经博士教授弟子,称为“官学”。博士所教授的经书都是今文经。汉初今文经学的主要代表是董仲舒,他传授的经书是《春秋公羊传》。《春秋》有三传,即《公羊传》《谷梁传》和《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均属今文经学。董仲舒依据《春秋公羊传》,阐发“奉天法古”和“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思想。董仲舒的治学方式为其其他今文经学家所仿效和继承,兼采阴阳五行学说为儒家经典撰作章句,传述大义,注重微言大义,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之说,遂成为今文经学的主要特点。除《春秋》外,西汉时讲《易经》的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及京房;讲《诗经》的齐、鲁、韩三家,都是今文经。所有这些今文经都讲阴阳灾异,天人感应,颇具神秘色彩。

东汉末年,何休作《春秋公羊传解诂》,倡导“三世”说,发挥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是汉代今文经最后的代表人物。此后,郑玄网罗众家,囊括大典,遍注群经,消除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界限。郑学盛行后,今文经逐渐消亡。直到清朝中期,今文经学又一度兴起。其后,康有为曾以今文经学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使之与政事相结合,但不久也趋于衰竭。以今天的眼光看,今文经学的著作中除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内容外,也包含一些自然科学的知识。

6. 古文经学

学术史上,以先秦古文字“篆书”书写的儒家经典,被称为“古文经”,训释、研究古文经的学问,被称为“古文经学”。

秦始皇焚书时,儒家经典多被焚毁,汉初学者传习的经书,大多以“隶书”书写,称“今文经”。但后来又在山崖屋壁中陆续发现一些被埋藏的儒家经典。如汉景帝时,鲁恭王刘馥从孔子旧宅壁中发现古文经传,凡《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共数十篇;又如,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从民间觅得不少

古文旧籍,有《周礼》《尚书》《礼》《礼记》《孟子》等。他还在自己的王国中为《毛诗》《左氏春秋》立博士,而《毛诗》《左氏春秋》也属古文经。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也都是古文。上述古文经传,皆未被立为官学,或收藏于汉朝秘府,或由民间学者私相传习。

至西汉末年,刘歆欲将《左氏春秋》《毛诗》和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立为官学,结果受到今文经学博士的群起反对,从而形成今古文经学的第一次重要争论。东汉光武帝立今文经十四博士,再次确立今文经学在官学中的统治地位。但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古文《费氏易》《左氏春秋》置博士,遂引发又一场争论。光武帝一度立《左氏春秋》博士,终因众人反对而被罢废。汉章帝时,贾逵力辩“《公羊》理短,《左氏》理长”,为古文经张目,而博士李育则作《难左氏义》反驳贾逵,这又是今古文经学的一次重要争论。最终,汉章帝接受了贾逵的主张,下诏命诸儒挑选高材生师从贾逵,传授《左氏春秋》《谷梁传》《古文尚书》《毛诗》,古文四经遂流行于世。东汉马融精于古文经学,以其学传授郑玄,郑玄结合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于是郑、贾之学流行数百年,为诸儒所取法。古文经学的特点是讲究文字训诂,探明典章制度,注重研究经文本身的涵义,不阐发“微言大义”及“阴阳灾异”之说。

五、参考书目

冯友兰著,涂又光译:《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李泽厚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2课 宋明理学

经历魏晋至隋唐历史的变迁,外域的佛教等文化元素引入中国,中国内部文化也发生了变化,如道教形成。这些变化促进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

一、教学目标和重点

(一) 教学目标

1. 知识与技能

知道唐代中期以来儒学的研习、传播面临新的严峻挑战的原因;知道“二程”的“天理”观念,朱熹的“天理论”,陆王“心学”。

结合孔孟之道与汉代经学,梳理儒家学说从春秋到明清时期发展的基本脉络。

2. 过程与方法

学习“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初步学会如何应用哲学的思想方法分析关于自然、社会、人的问题。

比较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与宋明理学的异同,比较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思想方法上的异同点,进而理解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学习成语故事程门立雪以及朱熹治学的事迹,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见贤思齐,刻苦学习。

(二) 教学重点

程朱理学的内容。

二、教学设计建议

(一) 教学过程建议

● 程朱理学

1. 以教材内容为依据,解释“理学”的含义(参考“知识链接”)。

2. 简要回顾第二分册第三、四单元的内容,理清汉代至宋代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提问:北宋理学形成的原因有哪些?学生回答后指出:儒家学说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总体而言,儒家学说在变化中不断丰富、发展着本身的文化内涵。经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变迁,儒学出现了困境,一些思想内容不适应社会的需要。再提问:儒学的困境来源于哪三个方面?学生回答后指出:其一,经历了“中国化”的佛教在中国发展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并有所发展的道教融入部分儒学伦理,并已有长足的发展和广泛的传播;“三教合一”“三教并行”的现状开始对儒学的正统地位构成威胁。其二,在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发生巨大变化,神学色彩浓郁的“天人感应”说不再盛行的情况下,今文经学的荒诞粗疏和古文经学的繁琐僵化已暴露无遗。传统经学既不能令人信服,也难与佛、道对抗,更无法